

论工具书的模糊性

王世伟

关于工具书的模糊性,我在《中文工具书检索方法谈》一文中已略有涉及,文章中提到了“工具书范围应当拓展”、“注意非工具书的工具书内容”、“专门工具书的多种功能”等观点。去年冬季,我在准备给全国高校图书馆馆长班讲授“中文工具书”课程时,首先遇到了工具书类型的逻辑界划问题,于是引起了我对工具书模糊性的一些思考。

一、工具书逻辑界划的融化重合

现在工具书指南的书籍已经出了很多了,其中对于工具书类型的界划大同小异,但认真考察一下各类工具书名称的逻辑定义及内容和实际中的使用情况,就可以看到其各自之间具有融化重合的特征。

1. 手册与辞典及其他。手册是汇集某一方面经常需要查阅的文献资料或专业知识的工具书。辞典是解释字、词的声音、意义、用法和形体构造,间或叙及源流的工具书。这里,辞典的界划非常清楚,内容是字、词,而手册的界划就显得含混,“某一方面,”既可以是字、词,也可以是其它什么。如近年来十分畅销的《唐诗鉴赏辞典》,完全可以易名为《唐诗鉴赏手册》,因为它符合“某一方面”的定义。手册与辞典的这种互易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按照逻辑学的观点来讲,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而本质属性必须具有并与其他各类对象区别开来的特征。显然,手册与辞典的互易性,说明他们不是两个完全区分的概念,他们之间具有重合性。这种融化重合的

现象,并不仅仅反映在手册与辞典的关系上,还反映在手册与其他类型工具书的关系上。如大家曾经非常熟悉的《人民手册》,年出一册,汇集了我国每年有关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外交等方面的资料,其内容与体例说明它属于“年鉴”类工具书,但是由于它符合手册“经常需要查阅”的定义,故名之为手册。

2. 百科全书与辞典。1974年,英百科出版公司刊行了第十五版全名为《新版三十卷本英国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即人们所熟悉的《大英百科全书》,其中“百科全书”条目中谈到:“词典这个词一直被广泛地用来命名百科全书,……甚至到今日,一部现代百科全书还会被称作一部词典。”条目中还列举了百科全书的种类,其中包括:综合性百科全书、百科词典、现代百科全书、专题百科全书、儿童百科全书、专业百科全书、国家与地区百科全书。可见,百科全书与辞典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专科性的百科全书与专科词典、综合性百科全书与语文辞典等非常相似。如日本数学会编的《数学百科词典》(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版)名为百科,实为专科词典。《辞海》实为综合性辞典,而或被称为百科全书。实际上,百科全书与辞典还是可以区分的,只是区分比较细微。一八八八年,《牛津大辞典》编者詹姆斯·默雷在该辞典第一卷序言中指出:“英语词典不是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是阐释事物;辞典是解释语词,只是为了确定语词

的正确含义和用法才去阐释事物。”

3. 类书与政书。类书是我国古代采取群书、分类编排、以便查考的资料汇编。政书是我国古代历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的资料汇编。一些中文工具书指南注意到两者的相异性,将其列为两种类型的工具书。而另外一些中文工具书指南注意到两者的同一性,如《文史哲工具书简介》一书认为:政书“按事物分类,依类编排,也属类书的范围。”张旭光的《文史工具书评介》一书将“政书”作为该书第四章“类书”的附录,并讨论了两者的区别。他认为,就内容而言,《九通》、《会要》只是各代或各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部门的历史记录,它和无所不包的类书显然有别。就编辑体例而言,虽同是分门别类排列资料,实际上也还有别。一般类书只辑录各书原始资料,归入各门类,编者并不加工叙述,也不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个别例外)。

《九通》就不然了,它们是通过史家运用资料,重新组织论述的系统著作,并非原始资料(当然各书中引用或附录许多资料,但并非以供资料为主)。

4. 名录与辞典。名录是简明扼要地介绍专业机构的清册,它侧重于机构的介绍,如《出版印刷业名录》(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5月版),收集了我国出版印刷业单位3466家,其中包括出版、印刷、印机制造、器材生产、物资供应及印刷教育科研等有关单位,内容包括单位名称、地址、业务范围、电话号码、电报挂号五栏。至于象《中医人名录》、《中国地名录》等,与其说是名录,不如说是人名词典、地名词典更为恰当。可见,在实际运用中,人们对于名录与辞典的逻辑界划显得有些含混不清,尽管名录本身的定义明确地告诉人们其内涵是突出对个人或组织机构的介绍,但“名录”一词不免给人带来一种望文生义的效果,即认为是某一方面名称的目录,故所以有《中

医人名录》、《中国地名录》的出现。

此外,书目与文摘、文摘与索引、目录与索引等也具有逻辑界划的融化重合性。

二、工具书类型区分的你我交叉

工具书各类型不仅在逻辑界划上具有模糊性,而且在内容上也呈现出交叉性,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我。

新华文摘社所编的《新华文摘》,每期最后均附有“报刊文章篇目辑览”,一般分为政治、经济、哲学、科学、教育、历史、文学几个大类,这种篇目辑览完全起着索引的功用。

现代百科全书的最大附属成分,无疑是全书的索引,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五版问世之后,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经过重大努力,在原书三部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索引》部分,即《简编》十二卷、《详编》十七卷、《类目》一卷、《索引》二卷。

姜秉正编的《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综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5月版),是一部目录专著,收录了1853~1981年国内外出版的有关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著、论文和资料等,但书中列有作者索引,成为全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各类年鉴中都含有书目、索引或文摘的内容,如一九八二年《中国历史学年鉴》(简本)列有“史学研究”、“中国史资料出版介绍”、“考古文物新发现”、“书目、论文索引”四个栏目,其中“书目、论文索引”部分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二强。

《全国新书目》一九八二年第十二期,一九八三年第十二期,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先后刊登了《全国出版社一览表》、《近年来全国各地新成立的出版社名录》。这是书目中包含有名录的例子。

三、工具书与非工具书的若即若离

1. 非工具书中的工具书内容。近年

来所出的书籍文献中,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即不少非工具书中都增加了一些属于工具书的内容,尤以目录、索引居多。如白滨所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最后附有“国内西夏研究论文资料目录索引”。又如,书目文献出版社版自一九八二年五月以来出版了一部传记丛书《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目前已出九辑。此丛书在每位社会科学家传记之后均附有著作及论文目录(或称之为年表、编年)。又如,刘永济所著《屈赋音注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1月版)一书附有“屈赋释词”,多达二百多页,析为三卷,计分“释虚词”、“释词汇”、“释句例”,将其视作“楚辞词典”也不为过分。

一些非检索性杂志中也往往收入一些工具书的内容。如杨楷所编《辞书学名词解释》,自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在《辞书研究》杂志上连载,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中国书目编年》编写组编写了《中国书目编年》,在《津图学刊》杂志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各期分期连载。

这种非工具书中的工具书内容是如此之多,有的学术价值极高,以至一些工具书指南也不能不予以重视了。如潘树广所著《书海求知——文科文献检索方法释例》(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期)一书的编例中谈到:

“本书介绍的图书资料,不限于工具书,如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不是工具书,但该书所附《中国戏剧本事取材之沿革》对查考同一历史题材的不同剧本极有用,最近又被收入《周贻白戏剧论文集》中。对这类书,本书亦予以介绍。

2. 工具书的可读性与非工具书的查检性。工具书一般是供人查检而不是供人阅读的,但也有其可读性的一面,象百科全书、年鉴之类的工具书,其阅读性的功能恐怕要比查检性的功能更强一些。象《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读者大多是

把它作为阅读的对象。尤其是《新华文摘》,由于其不少文章是全文刊登,而非摘要,其可读性更强。至于《唐诗鉴赏辞典》,完全是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欣赏文章的汇编,把这部辞典更名为《唐诗名篇赏析》,更符合该书的内容,由于其内容的特征,它更多地是起到阅读与欣赏的作用。

非工具书一般是供人阅读而不是供人查检的,但也有其可供查检性的一面。上面提到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记丛书以及由《中国语言学家》编写组编写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开始分册出版),其中众多人物的生平事迹以及附录的论著目录,其查检性的功能很强,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人物传记资料及当代社会科学家论著目录来看待。杨鸿年所著《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一书,将汉魏制度方面的问题,分为“宫省制度”、“宫卫制度”等四十七个专题,每个专题又分为若干个小标题,分别采集有关资料并加以考证。如“婚”这一专题下又分为“乱婚、早婚、再婚、结婚、离婚、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六个小标题。这种论著,实质上是一部丰富的汉魏制度的资料,其性质与功用介乎于政书、类书与辞典之间。又如,中华书局所出的《文史知识》杂志被人誉为文史知识的百科全书,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该杂志开辟的许多栏目,如“文学史百题”、“历史学百题”、“诗文欣赏”、“文史书目答问”、“文史工具书介绍”、“文化史知识”、“人物春秋”、“中国古代官制讲座”等等,均具有阅读与查检的双重功能。一些订阅或购买的读者都把它作为工具书加以收藏。

此外,一些题以“资料”的书籍,有的具有一定的查检性,有的纯粹是供人查检的。所以有的工具书指南中把资料也列入了工具书的范围。

3. 工具书与非工具书的名与实。工

具书与非工具书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为若即若离,而且在名称上时或表现出互相错乱。有的明明是工具书,但在名称上却难以体现出它的工具性;反之,有些明明不是工具书,但冠以工具书的名称。工具书与非工具书这种名实相离,给使用工具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比如一些以“概论”、“顾问”、“问答”、“入门”、“常识”、“讲座”等命名的书籍,其内容体例及其功用同手册没有什么区别。李钧编著的《工业企业常用物质概论》(冶金工业出版社1985年3月版)一书,其内容是介绍工业企业的常用物质的主要性能、用途、代用利用、验收保管、生产来源、牌号表示方法等基本知识,完全可以把这部书“概论”的名称变易为“手册”。朱天俊、倪晓建同志在《名录简论》一文中谈到了工具书与非工具书的名实问题:“……至于在介绍机构下面提供了有关人员的简况及住址,例如《新兴企业简介》,它应该属于名录。至于象《中国报刊名录》,就是报刊目录一类的工具书,虽有名录之名,但不能认为是名录。而《联合国情报系统指南》,虽无‘名录’字样,但实际上是名录。”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不仅工具书与非工具书之间有名实问题,而且工具书各类型之间也存在名实问题。

四、工具书模糊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 理论意义。首先,工具书的模糊性向我们提出了工具书研究中思维方法问题。过去我们在工具书研究中比较注重求异思维,而工具书模糊性的理论向我们提出了求同的思维方法。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研究工具书与非工具书、工具书各类型之间的区别,而且要注意研究工具书与非工具书、工具书各类型之间的交叉性、同一性问题。围

绕着政书与类书、类书与百科全书、《尔雅》是否是百科全书、目录与书目、地方志与地方文献等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从理论研究的方法上来分析,就是争论的双方各有偏颇,或注重于求同思维,或注重于求异思维,而没有把这两种思维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实际上,同异问题是相对的,求同往往能够更好地理解相异。

其次,工具书的模糊性告诉我们,工具书研究不仅要注意分析研究、个别研究,而且要重视综合研究、总体研究。工具书各类型之间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是一个系统,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各类型内各种工具书之间也有这种情况),有些类型之间简直是不可分割,即使为之界划,也是藕断丝连,我们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研究工具书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侧面。

再次,工具书的模糊性使我们对工具书及各类型的定义有了重新检查的必要,对工具书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模糊现象,提出了加以理论总结的要求。如工具书的名实论,需要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和说明。

2. 实践价值。工具书的模糊性,多少打破了工具书与非工具书、工具书各类型之间的界限,使研究工具书和使用工具书的人的眼界大大地拓宽了。使用工具书重在“活用”,要求检索者对于各种类型的工具书(包括非工具书)能综合利用,工具书的模糊性对于使用工具书的实践将起到理论指导的作用。

此外,书籍的作者、出版社的编辑、书店营业员、图书馆的馆员、情报所的资料员等在文献的写作、编辑、发行、交流的过程中都将从这一理论中或多或少地得到某些启示。